

全球化与去全球化*

豪尔毛伊·彼得

这些年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全球化的未来会是什么？面对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某些贸易政策限制，以及威胁全球生产链的冠状病毒疫情的后果，一些观点因此甚至认为这可能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全球化的世界经济确实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确定主要变革方向是一项不可避免的经济任务，同时也是长期经济政策行动的前提。

《经济文献杂志》（JEL）编码：F02, F10, F15, F20, F42, F51, F60, F62, F68
关键词：全球和区域一体化；去全球化；保护主义；外包；全球价值链（GVC）；碎片化；生产力溢出；无形资产；“大象曲线”

一，全球化的本质全球的和地区的一体化

全球化是一个涉及整个世界的深刻进程，其基础是世界经济的发展情势。这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其定义维度是全球一体化。一体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过去的70多年得以积极发展，并成为20世纪下半叶的主导趋势。

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如下：

- 国际贸易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不断增加；
- 国际货币和资本流动速度加快；
- 外资比重不断增加；外包、全球价值链的发展；移民；
- 信息、无形资产和知识的全球流动；
- 打破贸易和投资的政治行政壁垒，
- 国际组织和国际法规的发展；全球治理的需要；
- 政治、文化和环境因素的影响、相互作用，增加了世界经济中的相互

依赖（interdependence）。

全球化是一个综合的过程。通过全球贸易、金融、通讯、移民和运输网络实现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一体化。

其定义要素为衡量和评估全球化的现状和进展提供了机会。国际化指标，例如国际贸易、资本投资、移民、国际组织的形成或国际通信的发展（卫星广播、海底电缆、洲际移动电话连接等）也可衡量地表明这些过程的发展。它们提供了识别和评估新发展的机会。

*所刊文章只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不代表匈牙利国家银行的官方主张。

豪尔毛伊·彼得（Halmai Péter）：匈牙利科学院院士，布达佩斯技术与经济大学教授，匈牙利国家行政大学教授。电子邮箱：halmai.peter@gtk.bme.hu, halmai.peter@uni-nke.hu。

本文为“后疫情现象研究课题”撰写。

本文原文发表于《金融与经济评论》匈牙利文版2023年6月号《我们的前景》专题。
<https://doi.org/10.33893/FER.22.2.5>

万维网及其提供的机会已成为全球化的象征。情况与自由化类似：贸易自由化、私有化或放松管制的发展和影响。与此同时，围绕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概念出现了激烈的争论。该过程的假设或真实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每个参与者或观察者接受或拒绝的意见。

近几十年来，全球一体化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决定性的新现象。（有关更多详细信息，可参见：Palánkai等，2011）在当今的世界经济中，一体化进程发生在区域和全球层面。从一般意义上讲，一体化就是统一化、整合化。但在整合的过程中，其组成部分并没有失去其特性。

全球化的概念与一体化和转型的过程密切相关。全球化作为一个过程，将曾经分散的市场联合成一个更广泛的关系体系。在分配过程中，地理和政治限制的重要性逐渐减弱。资本的流动是由回报驱动的，人口的迁移是由就业和金融进步驱动的。所有这一切都得益于知识和信息的快速流动。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N. Bhagwati）将全球化定义为一体化：全球化是各国经济通过贸易、外国直接资本投资、短期资本流动、人员普遍国际流动和技术流动融入国际经济（Bhagwati，2007[2004]）。

全球一体化本质上是市场一体化。同时，一体化进程是由政府、国际组织和企业界一道有意识推动的。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和联系几乎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全球化的关键时刻是打破划分世界的壁垒。人们在行为上、法律上、语言上、文化上或心理上都变得越来越有能力，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相互联系。

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各国聚集在超国家的、以领土为基础的组织中，以改善合作并缓解现有的紧张局势。这些合作以不同的方式和程度，旨在实现人员、劳动力、货物、产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它通过区域线索与全球化联系在一起，但又并不完全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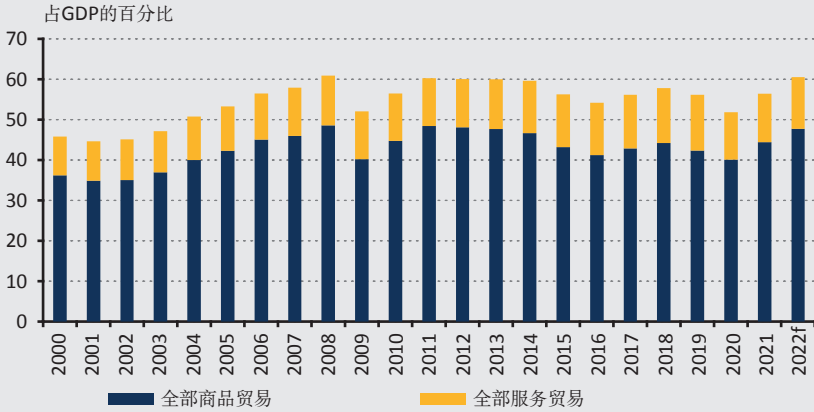
全球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相互叠加、紧密联系、相互作用。（在某些方面，它们可以互补，甚至相反。）一些国家之间的全球和区域一体化就是国际一体化。

二，全球化处于停滞？

在全球化的新兴进程中，过去十五年出现了明显的停滞。2008–2009年2010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导致世界贸易暂时下降10%以上。尽管2010年之后贸易大致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但其相对于世界GDP的比例不再增加（EC，2017；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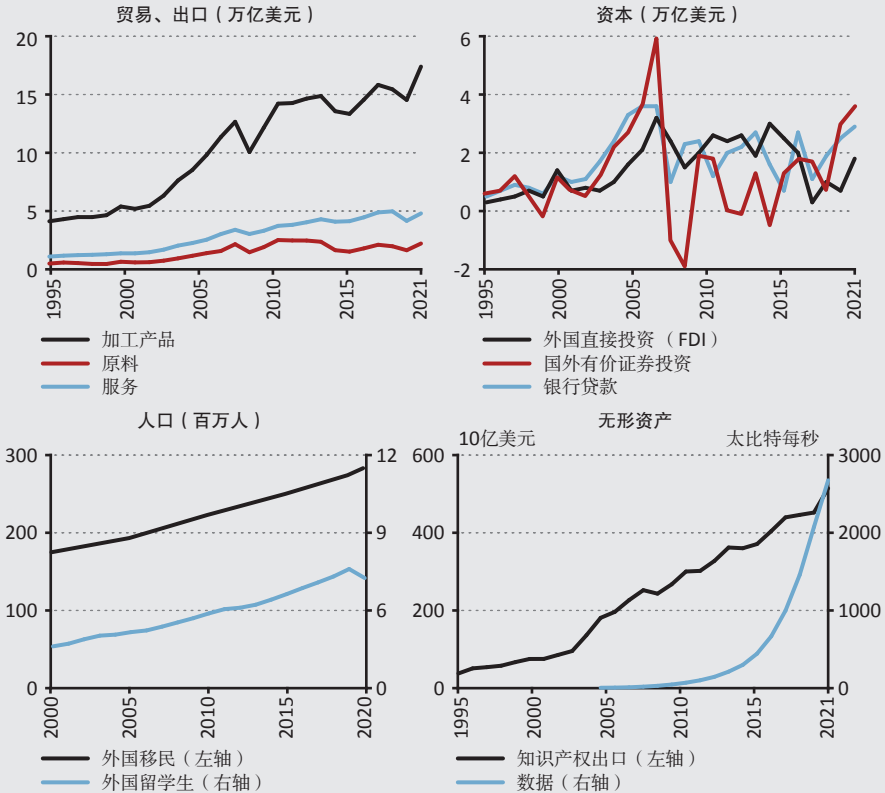
国际资本流动比2000年代初期温和得多（见图2）。国际移民——尽管它具有核心重要性并已成为一个政治话题——却非常微不足道：1990年以来，全球移民人口的比例从2.9%增加到3.4%仅增加了半个百分点。

图1：世界贸易占世界GDP比重的变化



说明：f—预测值
来源：EC (2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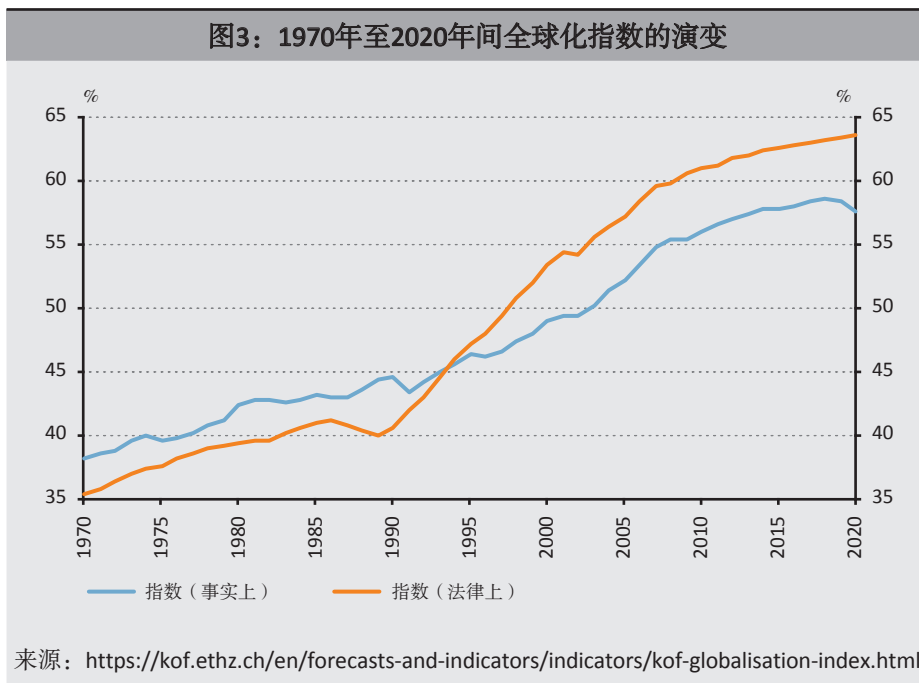
图2：近25年全球化的主要动力的国际流向



说明：标称数据，IP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知识产权
来源：Seong等 (2022)

使用最广泛的全球化指标，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全球化（综合）指数自2007年以来几乎没有增长，基本停滞不前（图3）。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之前，部分原因是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但在过去十五年里，跨境金融投机和欧洲国际银行贷款大幅减少。这并不是一个负面趋势：2007年之前的情况在很多方面都不健康。目前，金融世界更加平衡，更能抵御危机，尽管全球化程度较低。

图3：1970年至2020年间全球化指数的演变



国际贸易自由化是有案例的。一些政府正在转向传统的，或者更确切地说，非传统的非关税保护主义工具。所有这些都威胁到世界贸易的一体化，这是全球化的基本维度之一。全球贸易在过去十年失去了往日活力的事实也指向了这个方向，问题是其增长是否会恢复往日的速度。在金融危机之前，全球贸易占GDP的比例迅速增长。从1986年的41%上升到2008年的61%以上。从那时起，这一比率基本上停滞不前（见图1，Wozniak – Galar 2018）。考虑到更加复杂且有时充满敌意的全球贸易关系环境和不断变化的经济驱动力，自所示日期以来世界贸易的扩张大致与产出的动态平行，或者有些滞后（WTO，2022）。鉴于这些趋势，需要对导致全球贸易放缓的因素进行概述。

三，全球贸易碎片化风险

为了说明上述情况，值得回顾一下欧盟的国际贸易趋势。金融危机以来，欧盟对外贸易特别是服务贸易的增长超出了全球趋势。此外，随着一体化的发展，2000年至2021年间，欧盟货物贸易占GDP的比例增加了10个百分点：从57%上升到67%。（这一增长得到了欧盟对内和对外贸易政策的支持¹。）欧盟服务贸易比重增长快于货物周转，从2000年占GDP的14%增至2021年的26%。同样，欧盟经济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在2008年之前迅速上升，此后相对保持稳定。外国增加值在欧盟伙伴国的出口中（“前后参与”——“backward participation”），从2000年的12.7%上升到2012年的17.3%，然后下降到2018年的15.8%。欧盟内部的增加值在伙伴国的出口中（“前向参与”——“forward participation”），从2000年的14.9%增长到2008年的16.5%，然后在2018年增长14.9%[如此深度的数据只能追溯到几年前（EC，2023）]。

过去十年全球贸易动态放缓的原因有几个经济和政治因素。一方面，促进贸易的动力似乎正在耗尽。与此同时，国际贸易的关税壁垒减少。以世界水平计算的海关工业产品进入对外贸易的加权平均负担从1986年的13.6%下降到2008年的7.5%和2019年的3.9%。导致生产过程的地域分散，它们表现出收益递减（Antràs，2020）。由于制造业分工的稳定，高收入国家的进一步外包（offshoring）率有所下降。就新兴国家而言，中间产品在进口中的份额有所下降，因为后者越来越依赖自己的工业基础来采购投入品（Baldwin，2022）。最后，一些重要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结构性变化也可能导致贸易开放度和全球贸易活力的降低（例如全球价值链更加温和的一体化）。与此同时，与产品贸易相比，服务贸易保持了活力（新冠疫情冲击期间的旅游业除外），数字技术的发展增加了中间服务贸易²（Baldwin，2022）。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新冠病毒疫情给跨境贸易和全球价值链带来了压力。在新冠病毒疫情危机期间，由于关闭和其他限制性措施，一些远程供应商能力的脆弱性尤其导致了严重且持久的供应方问题（Javorcik等，2020；Meier - Pinto，2020；经合组织，2020；Hausmann，2020；Halmai，2022a，b）。某些中间体（零部件、组件、材料）供应的下降和物流问题（运输能力不足、运输成本上升）导致供应链严重中断。多个行业（例如汽车制造）缺乏微芯片已导致强制限制，在某些时期甚至导致生产停止。由于产量下降和停工，出现了价格上涨和前所未有的排队现象，特别是在新冠危机低点之后的时期。

当前中美之间的对抗导致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半导体、“绿色技术”等）采取限制性措施和支持性产业政策。新冠病毒疫情初期保健品的缺乏可能强化了“近岸外包”和供应链某些环节合理化的需求。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风险。地缘政治因素在贸易动态中的重要性有所增

¹ 过去20年，欧盟内部产品贸易占比总计达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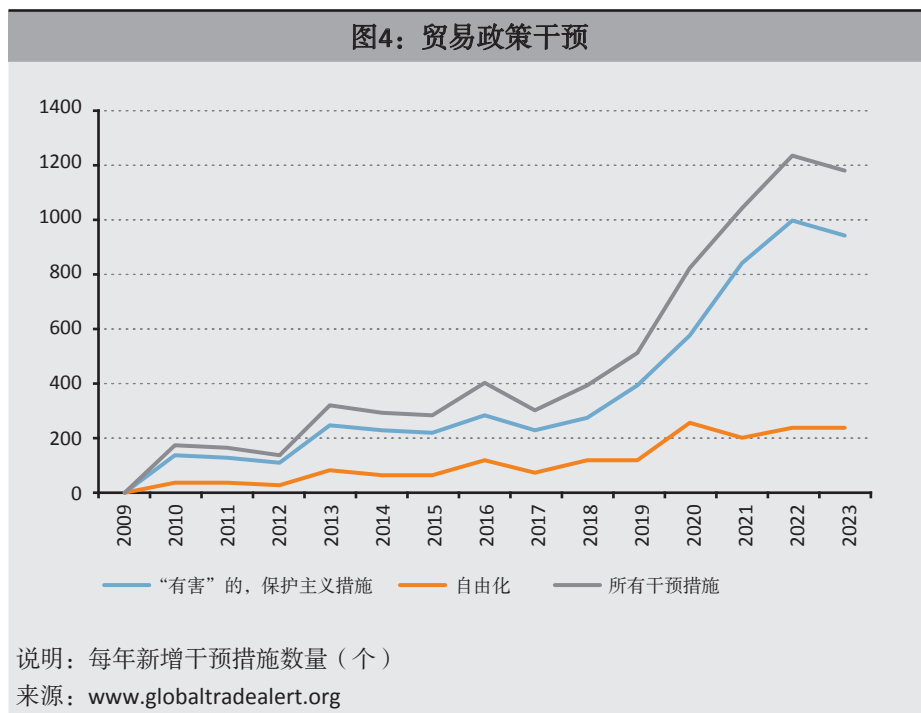
² 在欧盟等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尤其如此，这些国家和地区通常对此类出口几乎没有壁垒。

加。经济方面有时被置于次要地位。总体而言，提高供应来源的可靠性、改善需求响应或优先考虑国家安全的努力可能会导致一些供应链的重组和缩短（IMF，2022；Capital Economics，2022）。

实际上，贸易关系可能会受到监管挑战的影响，例如美国2017年终止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或世贸组织争端解决论坛无法成立。在这方面，多边机构促进全球贸易流动的能力已经减弱（Dadush，2022）。

贸易政策的最新发展表明跨境贸易环境和全球价值链的进程日益复杂。尽管关税全面保持较低水平，但自2020年以来非关税贸易限制大幅增加。首先是新冠病毒疫情，然后是俄乌冲突，最后是粮食和能源危机。因此，2010年至2019年期间，年平均实施的有害限制措施为71项，到2022年将增加到530项（见图4）。2021年，进口限制措施影响了世界进口的9.3%（WTO，2022），由于俄乌冲突后欧盟对俄的制裁，这一数字在2022年进一步增加。

图4：贸易政策干预



四，供应链：去全球化与重组

许多基本因素，其中包括明显的地缘政治联系、管理流行病的需要或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承诺，可能会导致政治需要重新安排价值链。许多国家正在引入补贴，以加强战略部门的“回流”，减少对外国技术和投入的依赖。例如在半导体生产领域，美国、欧盟、日本和中国都利用措施和补贴来建设和加强国内产业能力。[例如在美国，这一方向的补贴可能在未来十年内翻倍。《经济学人》（2023）]。最近的例子是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IRA）。许多补贴依赖于满足国内生产和采购来源的要求，扭曲了市场竞争条件。就某些供应链（例如电动汽车及其零部件的生产）而言，绿色技术领域采取的措施可能会导致回流。虽然其他经济体正在规划或实施类似的支持系统，但最近通过的欧洲绿色供应商行业计划强调了开放、基于规则的贸易制度以及贸易在绿色转型中的作用（EC，2023）。

企业可能会调整策略来应对这些挑战。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22年6月的概述，87%的受访者（在华经营的美国跨国公司）表示，中美紧张局势对运营和投资决策产生了影响，26%的受访者撤离了中国工业领域，29%的企业离开了美国，并使用中国特有的价值链，24%的企业不再在中国投资（EC，2023）。根据中国欧盟商会2022年4月编写的类似概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欧洲在华投资产生负面影响。7%的受调查企业在俄乌冲突爆发后考虑终止中国投资，39%的企业认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降低了中国的投资吸引力。

产业链重组的政治压力并没有立即使标准总贸易指标发生重大变化。价值链的重新排列是必要的。由于成本高昂和技术挑战，实施成了一项复杂的任务（IMF，2022），但政治努力可以改变贸易模式。（就自动化工作场所而言，在最发达国家，某些生产链节甚至不可能回归。）

美国占中国出口比重下降，东盟国家比重上升。印度的传统是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潜在新引擎（Banga，2022）。到目前为止，政治变化已经相当多样化，并没有破坏贸易关系。新贸易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重塑亚洲供应链，以应对中美之间不断恶化的贸易和地缘政治关系。预计其他地区也将进行类似的改革。中东欧可以增加对欧洲价值链的参与。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例如墨西哥）可能会增加对美国价值链的参与（AMRO，2021）。

在价值链的新组织过程中，出现了新的技术主权问题。后者不是21世纪的目标，而是手段。国家或一体化社会（例如欧盟）发展或获得经济竞争力的各个方面的能力，以及国家从其他国家采取行动的能力，采用适当技术而不陷入对其他经济领域的单方面结构依赖的能力（Edler等，2023）。基于经济福祉的技术主权使其公司能够在全球技术体系中自由、成功地竞争，并解决为人民提供高水平福祉的长期问题（Inzelt，2023）。

鉴于全球价值链重组的可能性，逆全球化的可能性也随之出现。然而，与以前相比，构建了更短、更脆弱的价值链，重组几乎没有被用作去全球化。

五，商业碎片化的危险

贸易模式的变化并不一定会对总体贸易指标产生负面影响，但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成本。价值链的重新安排是必要的，并且涉及高成本和技术挑战（IMF，2022）。最低限度限制国际贸易的国际壁垒、外国直接投资的下降和技术变革可能会降低资源效率，并对生产率增长和生产率溢出产生有害影响。贸易限制的增加和/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导致全球分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析，全球经济的严重碎片化——取决于其程度——导致全球产出永久性损失，根据模型计算，损失占世界GDP的0.2%至7%。将商业碎片化技术与分离相结合的情景显示，一些国家的产出损失占GDP的8%至12%（IMF，2023）。

总体而言，许多因素可能会限制全球贸易的前景，风险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过去十年阻碍贸易增长的一些结构性因素，例如交通和信息技术重大技术突破的影响有限，预计将基本保持不变。除前者外，近期的外部冲击以及国家和多边贸易政策的发展也表明对全球贸易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加剧。考虑到所有因素，确定贸易与潜在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Singh，2010），碎片化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潜在经济成本（IMF，2023）。

五，改变中的全球化

全球化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是人、经济和文化之间联系的增加。在全球趋势的阶段，重点是数字服务、信息和知识的流动。因此，全球化进程正在以不同的形式向前推进。

全球贸易中正在发生一场通信和技术革命。新技术成果（区块链、5G、电动汽车）的传播具有广泛的影响。与此同时，世界中产阶级可能会随着这一发展而扩大。生活水平，尤其是新兴市场的生活水平正在提高。所有这些都可能对未来几十年的全球贸易产生重大影响。根据麦肯锡公司（McKinsey）的预测（Lund等，2019），到2030年，全球消费量将比2017年翻一番。高达60%的增长可能来自新兴经济体。到2030年，后者可能达到全球成品消费量的三分之二。同样与新兴经济体的消费相关，过去十年跨境货物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有所下降。许多国家越来越有能力通过国内供应链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全球化趋势并没有停止，只是发生了转变（Wolf，2022）。到目前为止，全球化主要是关于商品、资本和人员的流动，但今天它更多地是关于服务、信息和数据的流动。对于全球化来说，人员和货物都不需要跨越国界，也不需要建立工厂。例如人们坐在电脑前可为跨国公司工作。世界上大多数最大的公司都不进行实体生产（微软、亚马逊、Alphabet、Facebook、腾讯、阿里巴巴）。

随着最智能和智能（AI）机器人的传播，及其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它们可能会带来比以前基于实体产品全球化的挑战更加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挑战。在世界各地，迄今为止从全球化中受益较多的体力劳动者和办公室职员可能会同时受到影响。

全球化进程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政治可能会阻碍货物贸易和实体工作的转移（从发达国家到新兴国家），但服务提供的全球化可以取代它们。

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的贸易经历了三波扩张（Baldwin, 2016）。第一波浪潮是与工业化相关的货物运输，然后是近几十年来生产单位迁移到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地区。第三个层次是服务贸易，例如服务贸易。通过信息技术（互联网等）实现的办公室“旅行”。脑力劳动者现在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工作。

前两次浪潮与第三次浪潮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的物体必须移动，而后者仅是信息在世界各地和国家之间流动。限制后者比前者的情况要困难得多，成本也高得多³。

动态增长是服务贸易的典型趋势。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中，服务型国家（美国、英国、法国或瑞典）的地位正在不断发展。专注于生产的国家则面临着新的挑战。寻求低劳动力成本本身越来越受到限制。研究和知识密集型部门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

企业投资中，有形资产占比下降。与此同时，无形资产支出⁴（软件、品牌建设、策划）占GDP总量的比例也呈上升趋势。后者往往没有准确反映在贸易统计数据中。根据麦肯锡公司（McKinsey）的估计，自2000年代初以来，发达市场的私营企业对无形资产的投资一直高于对有形资产的投资，并且两个因素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Lund等，2019）。

每年，美国公司的无形资产营业额达7700亿美元，其中包括IT公司。IT服务出口在许多其他经济体中也很常见。例如在韩国，几乎所有无形商品的出口都是由IT公司制造的。国际数据流量的增长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例如从2007年到2019年，国际年度数据流量增长了148倍，这意味着平均大约需要一年半的时间（Lund等，2019）。

互联网/技术/通信革命降低了交易生产成本，改变了流程，并可以促进进入新市场（Levinson, 2021）。可以实现重大的新技术变革：

- 数字平台（例如电子商务）和新技术开辟新市场、改善物流并降低协调成本。

- 令人着迷的智能和3D打印可以改变生产流程，并且零件贸易量可以减少。

- 在某些领域，数字化创新是服务，随着物理数据、视频、游戏数据载体的衰落和云服务的突破，可以替代物理数据。

- 国际贸易中可能会出现新的服务（例如远程医疗、虚拟现实和其他与5G相关的现象等）。

- 降低交易成本的技术（电子商务、区块链）会增加货物贸易量，而改变生产流程的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物流技术（电子汽车、可再生能源）则可以减少货物贸易量。

- 一个根本的挑战是培养采用新技术所需的技能。在后者以及服务业发展方面，走在前列的国家就能成为全球价值链的赢家。

³ 尽管有些国家，例如中国也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

⁴ 关于“明智”投资的重要性，可请参见：巴克赛（Baksay）等，（2022）：71–80页。

服务贸易监管主要涉及最终服务，而非中间服务⁵。后者的一个例子可以是会计师、分析师、管理人员、在线帮助热线工作人员、图形设计师、出版物编辑以及在最多元化的IT部门工作的人员的工作。服务贸易有着美好的未来，但它也可能具有破坏性：雇用世界各地的专家可能会威胁到发达国家大量中产阶级的就业机会。

七，全球化的争论

在讨论过程中，一个基本问题是焦点是全球化的假定后果还是真实后果。对普遍化（“全球性”香烟、饮料等）或“西化”（好莱坞电影、消费主义等）现象的评价大多是负面的。它们有时被视为对当地传统和文化的威胁。几十年来，只有通过外包和国际价值链实现的成本优势才具有显著的通货紧缩效应。对于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口来说，已经可以以优惠的价格获得标准的高质量产品。

贸易一体化和自由化进程及其基本制度受到批评。发达国家质疑实施高环境和劳动保护标准的必要性，认为这是削弱发达国家竞争力的企图。

与全球化相关的分配之争尤为突出。普遍流传的说法如下。富人从全球危机中受益：许多西方工人因外包而失业。西方工业就业人数的下降以及总体上实际工资的停滞导致了中下阶层对全球化的合理不满。但现实与上面引用的设置有根本不同。19世纪初和20世纪下半叶，世界总收入中最大经济体（G7国家）的收入确实出现了大幅增长。直到20世纪下半叶中叶，创新一直被困在一个狭窄的领域，从而加剧了收入不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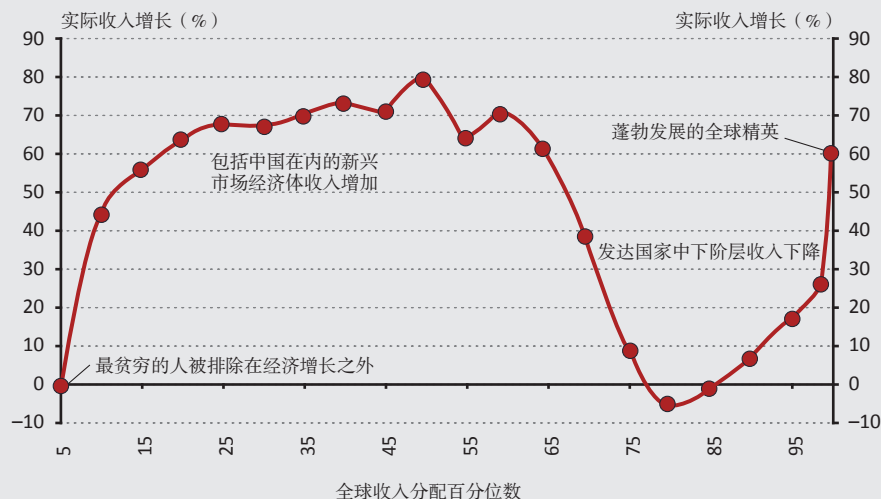
但信息通信革命（互联网、电话、计算机技术）使公司能够以低成本向世界各地输出知识。富裕国家已将部分工业生产转移到较贫穷的新兴国家。这一变化的结果是巨大的增长繁荣，数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

一些研究表明，自由经济政策对西方工业就业岗位消失的影响远小于技术的影响。全球创造的就业机会多于它消除的就业机会。问题的关键是新的工作需要更多的教育。

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所谓的大象形象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参见图5，原出处：Lakner – Milanovic, 2013）。描绘过去几十年收入分配过程的图表令人信服地表明：在研究期间，除了第三世界国家最贫困的公民之外，发达国家的中下阶层收入增长最低。事实上，甚至就某些群体而言，在长达20年的考察期内，生活水平确实出现了下降。

⁵ 服务商的业务就是提供服务。

图5：1988–2008年全球收入分配不同百分位数的实际收入变化
(按2005年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



说明：纵轴显示1988–2008年实际收入的累积变化(%)，以2005年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横轴显示全球收入分配的百分位数位置。百分位数分布范围为5到95，增量为5个百分点。前5%的人分为两个群组：前1%的人以及位于第95和第99百分位数之间的群组。

来源：Corak (2016) 根据Milanovic (2016)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经合组织是过去30年来不平等（以及衡量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加剧的最发达国家。对于一些国家来说，不平等程度与20世纪初一样严重。只有在整体经济中，在各个国家之间的比较中，全球的不平等才得以减少⁶。较贫穷国家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并且增长速度快于发达国家。

在这些进程的背景下，经历了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全球化进程中正在发生根本性的结构性变化。技术是基于知识型全球化的核心。当前发达国家中技能最低的中下阶层工人主要不是要与类似情况下的远东劳动力竞争，而是要与机器人化竞争。我们需要关注的不是保护工作场所，而是保护劳动者。全球化所展现的第三阶段极具挑战性。

在许多国家，反全球化情绪已经成为政治性的、一种反建制的叛乱、愤怒的政治。其中重要阶段包括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一些反全球化民粹主义政党的壮大等。反对全球化并不是这些趋势背后的唯一驱动力，但它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需要强调的是：反对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是发达国家日益加剧的不平等。

⁶ 米拉诺维奇 (Milanovic, 2022) 的最新分析也证实了这一趋势。

全球趋势也是政治工具，国际贸易的好处很难具体把握。另一方面，它的具体失败者——尽管他们很少——可以被识别出来，并以决定性的方式让他们的声音被听到。全球化的停滞实际上比民粹主义的进步早了6到8年。而在政治性的主题化之后，可以说：“全球化正受到围攻”。

事实上，全球化并没有倒退。迄今为止，其主要参与者的活力已经放缓。只有一个仅提供可见地平线的最新维度脱颖而出。

最大的危险可能是加剧碎片化的反全球化经济政策。保护主义加强、非关税限制加强、贸易歧视加强，是阻碍发展的趋势。为了应对技术驱动的全球化的狂野驱动力，还需要采取全球政治措施。但鼓吹全球化终结的民粹主义者的主要信息之一是拒绝国际政治合作。

建立和加强多边规则和机构是进一步深化全球一体化的先决条件。民族国家和将它们聚集在一起的区域一体化可以拥有许多工具来影响进程和降低风险。提高竞争力应成为经济政策的重点。有必要制定和实施促进这些目标的深层次结构改革。这些字体的作用是扩大预算的回旋余地，比以前更有针对性、更恰当地使用资源。它们对于支持市场竞争、自由贸易和减少不必要的行政负担的措施非常重要。劳动力市场改革、积极支持继续教育和就业以及扩大社会安全网是必要的。后者可以防止失业者陷入贫困螺旋。

如果世界各国政府以北欧福利国家为榜样，积极支持人民的再培训、劳动力市场的繁荣和住房，这将是一个解决方案。教育的发展也至关重要：不应该把年轻人教育成过度专业的野蛮人，而应该把他们教育成能够适应日益快速变化的世界的人，从而将终身学习的过程视为理所当然。需要创造力、人际关系和面对面接触的工作场所将无法被远程控制机器人取代。

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必要性至关重要。因此，贸易和投资改革的成果可以被广泛的社会共享。这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应该更好地向公众阐明全球化的好处，而其明显的失败者应该得到补偿。

八，若干结果

全球化的决定性时刻是连接全球经济各个组成部分的流动和网络。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产品商业流动和国际资金流动动态与前几十年相比有所放缓。另一方面：在较高水平上稳定下来，服务和无形商品（包括知识产权、数据和信息）流动的动力成为全球化进程的新驱动力。

贸易仍然是全球化的基本领域。确保更严格的贸易限制和/或更高的贸易政策全球碎片化。全球经济的严重碎片化——取决于其程度——会导致永久性的全球排放损失。

一些基本因素、地缘政治联系、应对流行病的需要或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承诺可以引导政策达到重振价值链的地步。只有构建比以前更短、更脆弱的价值链才算不上去全球化。在价值链的组织过程中，出现了新的技术主权问题：一个国家（或一体化）使其企业能够在全球技术体系中自由、成功地竞争，并建立足够高水平的良好技术的能力。从长远来看，是为了人民。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以研发为基础、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服务型国家的地位

可能会得到有利发展。与此同时，以生产为基础的经济面临着新的挑战。低劳动力成本本身变得越来越不具有决定性。

全球化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是人、经济和文化之间联系的增加。在全球趋势的阶段，重点是数字服务、信息和知识的流动。全球化进程继续以不同形式推进。因此，事实上，全球化并没有发生逆转。尽管迄今为止其主要参与者的活力已经放缓，但与此同时，提供几乎不可视前景的新维度正在脱颖而出。

最大的危险可能是加剧分裂的反全球化经济政策。为了应对技术驱动的全球化的狂野驱动力，还需要采取全球政治措施。构建和加强多边规则和机构是全球一体化进一步深化的前提。民族国家和将它们聚集在一起的区域一体化可以拥有许多工具来影响进程和降低风险。提高竞争力应成为经济政策的重点。有必要制定和实施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来推动这一目标。它们对于支持市场竞争和自由贸易以及减少不必要的行政负担的措施非常重要。通过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贸易和投资改革的成果可以让广泛的社会受益。

参考文献

AMRO (2021): *Global Value Chains in the Post-Pandemic New Normal*. (《后疫情新常态下的全球价值链》) ASEAN+3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https://www.amro-asia.org/asean3-regional-economic-outlook-2021-full-report/>

Antràs, P. (2020): *De-Globalisation? Global Value Chains in the Post-COVID-19 Age*. (《去全球化？后疫情时代的全球价值链》)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8115. November. <https://doi.org/10.3386/w28115>

Baksay, G. – Matolcsy, Gy. – Virág, B. (eds.) (2022): *New Sustainable Economics – Global Discussion Paper*. (《新可持续经济学——全球讨论文件》) Magyar Nemzeti Bank (匈牙利国家银行). https://www.mnb.hu/web/sw/static/file/NEW_SUSTAINABLE_ECONOMICS_-_Global_discussion_paper_2022.pdf

Baldwin, R. (2016): *The Great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New Globalization*. (《大融合。信息技术与新全球化》)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ttps://doi.org/10.2307/j.ctv24w655w>

Baldwin, R. (2022): *The peak globalisation myth*. (《巅峰全球化神话》) VoxEU, 31 August. <https://cepr.org/voxeu/columns/peak-globalisation-myth-part-1>

Banga, K. (2022): *Opportunities, risks and realities of India'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印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机遇、风险和现实》)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3 September. <https://www.ids.ac.uk/opinions/opportunities-risks-and-realities-of-indias-participation-in-global-value-chains/>

Bhagwati, J. (2007) [2004]: *In Defense of Globalization. With a New Afterword*. (《捍卫全球化。及新后续》)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pital Economics (2022): *Global Economic Fracturing*. (《全球经济分裂》) October.

- Corak, M. (2016): *Worlds of Inequality. The winners and losers of globalization. Must it be this way?* (《不平等的世界。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一定要这样吗?》) The American Prospects – Ideas, Politics & Power, May 18. <https://prospect.org/power/worlds-inequality/>. (下载日期: 2023年5月24日)
- Dadush, U. (2022): *Deglobalisation and Protectionism*. (《去全球化和保护主义》) Working Paper 18/2022 Bruegel. <https://www.bruegel.org/sites/default/files/2022-11/WP%2018.pdf>
- EC (2017): *Reflection Paper on Harnessing Globalisation*. (《关于利用全球化的反思文件》) European Commission COM (2017) 240 of 10 May. https://commission.europa.eu/system/files/2020-07/reflection-paper-globalisation_en.pdf
- EC (2023): *European Economic Forecast Winter 2023*. (《2023年冬季欧洲经济预测》) European Economy, Institutional Paper 194, EC DG ECFIN, Brussels. https://economy-finance.ec.europa.eu/system/files/2023-02/ip194_en_1.pdf
- The Economist (2023): *The destructive new logic that threatens globalisation*. (《威胁全球化的破坏性新逻辑》) The Economist, 14 January.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23/01/12/the-destructive-new-logic-that-threatens-globalisation>
- Eidler, J. – Blind, K. – Kroll, H. – Schubert, T. (2023): *Technology sovereignty as an emerging frame for innovation policy. Defining rationales, ends and means*. (《技术主权作为创新政策的新兴框架。定义理由、目的和手段》) Research Policy, 52(6): 104765. <https://doi.org/10.1016/j.respol.2023.104765>
- Halmi, P. (2022a): *Poszt-covid kilábalás: középpontban a kínálati oldal*. (《后疫情复苏: 关注供给侧》) Közgazdaság (匈牙利《对外经济》), 66(1–2): 58–71. <https://doi.org/10.47630/KULG.2022.66.1-2.58>
- Halmi, P. (2022b): *COVID-19 Crisis and Supply Side Bottlenecks in the EU. Shorter and Longer Term Prospects*. (《欧盟的疫情危机和供应侧瓶颈。短期和长期前景》) Montenegrin Journal of Economics, 18(4): 19–30. <https://doi.org/10.14254/1800-5845/2022.18-4.2>
- Hausmann, R. (2020):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Supply Chains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s a Result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冠状病毒大流行导致制造业全球供应链转型》) Financial and Economic Review, 19(3): 130–153. <https://doi.org/10.33893/FER.19.3.130153>
- IMF (2022): *Global Trade and Value Chains During the Pandemic*. (《疫情大流行期间的全球贸易和价值链》) Occasional Paper. In: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22 – War Sets Back the Global Recovery, pp. 87–107. <https://www.elibrary.imf.org/display/book/9781616359423/CH004.xml?tabs=fulltext>

- IMF (2023): *Geoeconomic Fragmentations and the Future of Multilateralism*. (《地缘经济碎片化和多边主义的未來》) Staff Discussion Notes 2023/1. <https://doi.org/10.5089/9798400229046.006>
- Inzelt, A. (2023): *A technológiai szuverenitás felvilágosult koncepciója*. (《技术主权的开明概念》) Portfolio (匈牙利《文件夹》杂志), 4月16日. <https://www.portfolio.hu/gazdasag/20230416/a-technologiai-szuverenitas-felvilagosult-koncepcioja-608248>
- Javorcik, B. (2020): *Global supply chains will not be the same in the post-COVID-19 world*. (《后疫情世界中全球供应链将有所不同》) In: Baldwin, R. E. – Evenett, S. J. (eds.) *COVID-19 and Trade Policy: Why Turning Inward Won't Work*. (《疫情和贸易政策：为什么向内转向行不通》) CEPR Press, pp. 111–116
- Lakner, C. – Milanovic, B. (2013): *Global Income Distribution. From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to the Great Recession*. (《全球收入分布。从柏林墙倒塌到经济大衰退》)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6719, The World Bank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Poverty and Inequality Team, December.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server/api/core/bitstreams/ed8d4ff4-8768-5c79-8266-1d151eff85b9/content>
- Lakner, C. – Milanovic, B. (2016): *Global Income Distribution: From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to the Great Recession*. (《全球收入分配：从柏林墙倒塌到大衰退》)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30(2): 203–232. <https://doi.org/10.1093/wber/lhv039>
- Levinson, M. (2021): *A fourth globalisation. A new form of trade is reshaping our world, and it's driven by the movement of bits and bytes, not goods, around the globe*. (《第四次全球化。一种新的贸易形式正在重塑我们的世界，它是由比特和字节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驱动的，而不是货物的流动》) <https://aeon.co/essays/the-globalisation-of-ideas-will-be-different-than-that-of-goods>
- Lund, S. – Manyika, J. – Woetzel, J. – Bughin, J. – Krishnan, M. – Seong, J. – Muir, M. (2019): *Globalization In Transition: The Future Of Trade And Value Chains*. (《转型中的全球化：贸易和价值链的未來》)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January. <https://www.mckinsey.com/~media/mckinsey/featured%20insights/innovation/globalization%20in%20transition%20the%20future%20of%20trade%20and%20value%20chains/mgi-globalization%20in%20transition-the-future-of-trade-and-value-chains-full-report.pdf>
- Meier, M. – Pinto, E. (2020): *Covid-19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疫情引起的供应链中断》) Covid Economics, 48: 139–170. <https://cepr.org/node/390621>
- Milanovic, B. (2016): *Global Inequality. A New Approach for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全球不平等。全球化时代的新方法》)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ttps://doi.org/10.4159/9780674969797>
- Milanovic, B. (2022): *The three eras of global inequality, 1820-2020 with the focus on the past thirty years*. (《全球不平等的三个时代，1820年至2020年，重点关注过去三十年》) Stone Center on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59, Revised December. <https://doi.org/10.31235/osf.io/yg2h9>

- OECD (2020): *COVID-19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Policy options to build more resilient production networks*. (《疫情与全球价值链：建立更具弹性的生产网络的政策选择》) OECD Policy Responses to Coronavirus, 3 June. <https://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covid-19-and-global-value-chains-policy-options-to-build-more-resilient-production-networks-04934ef4/>
- Palánkai, T. – Kengyel, Á. – Kutasi, G. – Benczes, I. – Nagy, S.Gy. (2011): *A globális és regionális integráció gazdaságtana*. (《全球和区域一体化的经济学》)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匈牙利科学院出版社).
- Seong, J. – White, O. – Woetzel, J. – Smit, S. – Devesa, T. – Birshan, M. – Samandari, H. (2022): *Global flows: The ties that bind in an interconnected world*. (《全球流动：互联世界中的纽带》) Discussion Paper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November 15. <https://www.mckinsey.com/capabilities/strategy-and-corporate-finance/our-insights/global-flows-the-ties-that-bind-in-an-interconnected-world>
- Singh, T. (2010): *Does International Trade Cause Economic Growth? A Survey*. (《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增长吗？——一项调查》) *The World Economy*, 33(11): 1517–1564. <https://doi.org/10.1111/j.1467-9701.2010.01243.x>
- Wolf, M. (2022): *Globalisation is not dying, it's changing*. (《全球化并没有消亡，而是在变化》) *Financial Times*, 13 September. <https://www.ft.com/content/f6fe91ab-39f9-44b0-bff6-505ff6c665a1>
- Wozniak, P. – Galar, M. (2018): *Understanding the weakness in global trade*. (《了解全球贸易的弱点》) 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orate-General for Economic and Financial Affairs. <https://doi.org/10.2765/30756>
- WTO (2022): *Annual Review*. (《年度报告》) Geneva.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anrep_e/ar22_e.pdf